

超越科尔伯格的男性认知逻辑局限

——当代道德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潘蕾琼, 黄甫全

(华南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 近年来, 围绕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及其发展的争论和研究, 一直绵延不绝。大量文献批判性地揭示, 科氏理论存在男性中心潜意识、认知独断和线性逻辑等缺陷。男性中心忽视了女性, 进而在道德发展上用“公正”标准排除了“关怀”原则; 认知独断将复杂道德发展的实质化约为认知发展, 进而用认知发展取代了道德发展的全摄性; 线性逻辑将丰富的道德发展过程假设为循序而进的“三水平六阶段”, 以至失适于多元文化。新近的研究因应这些批判的挑战, 不仅向外开出了“关怀教育理论与实践”新路向, 而且向内扩展了道德发展与社会习俗、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道德图式与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新视野, 从习俗、情感与文化三个维度修正和创新道德发展理论。

[关键词] 科尔伯格;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道德发展理论; 新科尔伯格理论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469(2012)05-0083-08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在西方关于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的探讨和争论中, 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 1927~1987)所提出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及相关研究可谓是独树一帜并引领了整个德育理论的发展。众多专家学者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不同视角, 围绕道德认知发展和道德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反思, 向科氏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与此同时, 一批科氏理论的忠实追随者则直面挑战和批评, 进一步拓展道德认知领域的理论研究, 促进了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发展, 并不断地启示着现实中的德育研究、德育改革和德育课程与教学的创新。对于科尔伯格及其理论的影响, 以色列学者查赞·巴里就曾这样描述: “柯尔伯格是现代道德教育复兴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 柯尔伯格的研究工作主导着高等学校、学术和通俗刊物、讨论会和研究班中的道德讨论。他为哲学家和中学校长、心理学家和监狱看守、社会学家和学校教师所熟悉。在今天道德讨论的学术会议上或资料汇编中, 柯尔伯格的名字无处不在。”^[1] 如此的影响和评价也足以证明科尔伯格及其理论在当代道德研究视域中无可取代的地位。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是一个乐观的理论, 然而也是一个有待继续修改完善的理论, 就如他的学生莱塞特所说: “道德心理学家应当保持科尔伯格孜孜不倦地探求发展道德研究时的‘大胆果敢’的精神。”^[2] 后来的学者们也确实秉承着这种精神对该理论进行了客观的批评和不断地修正、发展, 从而促进了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收稿日期] 2011-12-15

[作者简介] 潘蕾琼(1988-), 女, 宁夏固原人, 华南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硕士生; 黄甫全(1957-), 男, 四川洪雅人, 华南师范大学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科氏理论的三重批判与超越

20 世纪 70 年代,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被学术界引以为道德教育的经典论著,而且被一线中小学广为接受。但是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美国基础教育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和道德危机,学术界对科氏理论的质疑和批判也从此不绝于耳。面对种种质疑,一方面,科尔伯格本人以谦虚的态度作了回应,并在质疑声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以创新的态度开展研究,对已有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论加以超越。

(一) 男性中心潜意识的批判与超越

现在看来,也许是皮亚杰误导科尔伯格将男性中心潜意识嵌入了他的道德发展研究之中。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是最早把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引入到道德教育中的,而科尔伯格受皮亚杰早期认知学说的影响,把道德的发展界定为正义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他认为,“道德判断最基本的或核心的结构是正义原则的结构。每一个(道德)阶段的核心就是一个潜在的正义概念,每个较高阶段旨在更好地解决正义问题”。^[3]皮亚杰在其早期的研究中也曾指出性别差异明显存在于儿童对游戏及其方法的选择上,且男孩的规则意识较女孩稍强些。于是,科尔伯格继承了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的特点,同样把遵守规则作为衡量道德发展的标准之一,并认为女孩游戏中的道德成分明显少于男孩的游戏,以至在他理论建构的最初阶段所采用的研究样本均为男性。由此,在科氏的理论中,对于女性的道德发展几乎没有给予公正的判断。

作为科尔伯格的学生和一位女性,吉利根(Gilligan, C.)是最早对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发起挑战的人之一。吉利根认为,科尔伯格以男性被试为样本进行试验研究得到的女性道德发展水平较低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显然是一种以男性视角来审视女性道德水平低于男性的狭隘观念。吉利根不仅对科尔伯格实证结果的性别偏见加以批判,而且指出了科尔伯格在其理论的建构中没有包含妇女的体验和声音。

吉利根指出,无论是正义还是关怀都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道德认知方式,都是从不同角度得出道德选择和判断的结果。而科尔伯格的理论将公正作为普世价值和惟一道德标准,忽视了除公正之外其他的道德取向,因而也忽视了女性的特殊道德观。为此,吉利根也同样采用科尔伯格实验的方法和经典问题,尝试运用“海因茨偷药”对被试进行试验,发现有的被试出现了除“公正”道德价值取向的反应外,还出现了另一种道德价值取向的反应,即“关怀”取向的反应。而且,这一道德价值取向明显地存在于女性被试者的道德思维中,但是在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中却毫无论述。因此,吉利根提出了与科尔伯格的“公正”道德价值取向一样重要的“关怀”取向,也将其作为检验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另一标准;并且,关怀道德是与公正道德一样按照一定的发展顺序逐渐成熟的。吉利根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即公正取向和关怀取向是人类社会共存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道德观。前者更多地注重客观性、逻辑性和理智性,是道德理性维度;而后者则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和情感性,是道德情感维度。

吉利根旗帜鲜明地提出,女性和男性因其心理发展特征和水平的差异而产生道德思维方式的不同。女性道德思维的关怀取向是不同于男性所偏重的“公正”取向一样的道德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吉利根对科尔伯格的批评,既不是最苛刻的,也不是最彻底的。她继续承认许多认知发展主义者的假设,并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对科尔伯格观点的校正和补充,而不是对科尔伯格的全盘否定。吉利根的研究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超越了当前认知发展理论的局限,并继续发展了这一理论。第一,吉利根力图通过在人类发展理论的建构中包含女性的声音,来彻底打破认知发展心理学内外长期坚

持的“男性主义”传统。第二,吉利根试图将人类发展研究的方法学传统由标准的心理学实证研究方法,扩展为对人类生活的洞察以及文献和文学评论、历史和编年史、人类学和人种学的发展。^[4]

与此同时,内尔·诺丁斯(Noddings, N.)也从教育学的视角对科尔伯格的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道德发展理论对道德的认知维度尤为信奉,并把道德认知能力提到了一个过分的高度,忽略了道德的情感培养过程,换言之,即没有把道德成长中的情感因素考虑进来。^[5]诺丁斯还进一步将其对关怀缺失问题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形成了著名的“关怀教育理论”。在其理论中强调情感在个体道德发展中的作用,主张以关怀为核心来组织教育,认为“幸福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一种好教育应该贡献给孩子个人和集体的幸福”。^[6]这与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观有很大的不同,对科氏理论中以促进个体道德认知发展为目的的德育相悖,完全突破了科尔伯格男性中心潜意识的局限思想。

(二) 认知独断的批判与超越

科氏理论奠基于心理学的认知理论,主要继承了皮亚杰的观点,把儿童的道德发展看作是整个人类认知发展的一部分,从而认定儿童的道德成熟过程就是道德认知的发展过程。科尔伯格尝试着以认知心理学中的认知发展统摄人的道德发展的整个过程,他认为个体的道德认知,尤其是以道德认知为基础的道德判断是个体道德的重要部分,对个体的道德情感、意志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作用。针对科氏理论的这一观点,欧文·弗拉纳根(Flanagan, O.)最先站出来加以深刻剖析并尖锐地指出,认知心理学用认知遮蔽人的发展包括道德发展的全摄性。他通过系统地文献考察和实证研究,对科氏道德发展的研究与理论中的认知独断进行了层层剖析与批判,进而促使科尔伯格拓展自己的理论以超越认知局限。

首先,弗拉纳根指出:“科尔伯格的阶段没有给我们一个道德领域的全面描述。没有这样一个全面的描述,确定道德发展最高阶段的声称是非常夸张的。”^[7]科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涉及到了关于“公正”冲突的解决,但没有提到其他的道德价值取向如关怀和关心他人的重要性。而且,弗拉纳根提到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是道德推理发展的理论,只关注到认知角度的道德判断的发展,几乎排除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的研究。但实质上,道德发展受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影响,最终目的是表现为道德行为。然而,科尔伯格的理论却缺少对道德主体的情感、行为进行有计划的关注。

对此,科尔伯格回应道:其他所有的道德领域都是以公正推理阶段为先决条件的,因此以公正推理为核心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是对人的道德发展的全面而综合的描述。同时,他强调任何特殊的发展阶段其实质都包含在道德发展序列的某个阶段,而且,越高级的道德阶段越倾向于遵循这种道德发展序列,因而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心的发展是包含在道德发展序列的某个阶段中的。

其次,弗拉纳根质疑科尔伯格的阶段次序是否能满足这些阶段的标准。他指出,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次序在皮亚杰的智能发展模型中有两方面是普遍不能满足的。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阶段都能在所有的文化中找到;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正常个体都会经历所有的阶段而达到最高阶段。

对此质疑,科尔伯格并没有通过断然否认来维持他的阶段次序的普遍性的论断。他认为,假设给出的具有普遍共同性的理想世界和个体生活的实实在在的道德世界之间的差异,决定了道德发展阶段序列虽异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序列却一样具有普遍性。按照理想的理论假设推理,只要从环境中接受到合适刺激的所有个体实际上确实能发展到道德推理的后习俗水平(第六阶段)。但是,科尔伯格大量实证研究的资料显示出——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不是所有的个体都能达到后两个或后三个道德发展阶段,甚至在某些文化中没有个体能达到最高阶段。科尔伯格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皮亚杰的智能发展模型中,每一个儿童几乎都能经历理论假设中物理世界变化的情景,因而其认知发展序列适用于所有正常个体。但在个体的道德发展过程中,每个个体生活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道德环境中,并非每一个个体都有适当的角色扮演机会,让他们可以像假设的那样去决定

一组中较好的角色,从而顺利地经过科尔伯格道德发展观的所有阶段,最终达到最高阶段,因此他认为弗拉纳根对这一假设理论的阶段次序普遍性的质疑是经不起推敲的。

另外,弗拉纳根一直认为科尔伯格的研究方案有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仅仅通过道德两难问题测验来简单地检验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可能严重地限制了这种假设的可靠性,并且这些两难问题中的权利冲突也只是为道德判断提供了非常有限的选择余地。他进而指出,科尔伯格的道德阶段理论缺少一定的道德特征,必须补充一些可以具体表征道德生活的特征。

科尔伯格对上述批评也作出了回应,他声称其理论在所有道德方面都预先假设了一些公正推理的阶段,而在具体的道德两难问题情境中对个体某种行为的解释都是根据这一道德推理阶段加以系统表述的。道德原则是建构具体道德情景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固定的准则,也不只是独立依附于环境的规则。这样,欧文·弗拉纳根对此的质疑,其实科氏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是有所涉及的。

(三)线性逻辑的批判与超越

科氏理论尊奉一种僵化的线性逻辑,将丰富的道德发展过程描述和规定为循序而进的“三水平六阶段”,从而失适于多元文化。

在重重涌现的质疑和批判声中,其中一些批评直接指向科氏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阶段和阶段自身的逻辑顺序。如阶段5和阶段6之间的区分不清晰;阶段2和阶段5之间可以发现的概念联系在阶段2和阶段3之间不存在;阶段与道德行动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因此,一些人认为科氏的道德发展阶段只是一般的认知阶段,而不是道德的、发展的阶段。

其中最有力度的批评者是辛普森(simpson, E.),他对科氏道德认知理论提出了四点质疑:第一,判定“个体以不变的顺序经过这些阶段”的论断未经证实。她指出,这种阶段理论仅仅为阶段2、阶段3和阶段4所证实。第二,科氏的阶段理论不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因为科尔伯格没有研究足够多的文化以证明他的普遍性论断,并且他没有在所有的文化中发现后习俗推理,如果后习俗推理在受西方影响的城市文化中更占优势,那么科尔伯格的道德阶段理论存在着文化上的偏见。就此,科尔伯格对辛普森的指责作出了回应,他承认阶段5的推理较少在一些文化中出现,但确实在某些文化中发现了此类推理。同时,必须认识到阶段5较少出现与阶段5作为一种结构而存在的主张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第三,道德判断能力的评价方法有语言上的依赖。科尔伯格对此回应,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显示出言语流畅性或复杂性与道德阶段之间仅仅是极低水平的相关。第四,道德阶段理论及其方法论有文化偏见,把一种文化看作比另一种文化更有道德价值。对此,科尔伯格指出各个团体通过测试所得的平均数是无法转化成其相对道德价值,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判断也不构成对一种文化的道德评价。而且,虽然在阶段5上得分的个体比阶段3上的个体能解决更多的道德问题,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有道德价值。^[8]

与此同时,威廉姆斯(williams, B.)等人根据研究所得的实证资料,认为阶段3和阶段4并不是相继发展的顺序,而是平行的或交替的顺序。^[9]而另一位批评者弗利克尔(freenkel, B.)注意到阶段阐述中的矛盾:“如果阶段越高就越好,那么较高应该包含较低阶段中发现不了的东西,然而,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较低阶段的那些人将怎样理解较高阶段的那些人的争论呢?怎样接受像那些比他们自己的更好的推理呢?如果不是阶段越高越好,那么帮助年轻人通过这些阶段就似乎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弗利克尔通过对科氏理论的阶段序列发展的现实情景思考,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这一质疑虽然缺乏实证的检验,仅仅是依靠对现实情况的假设推理,但不可否认他的质疑应该引起人们对阶段序列的深入反思。^[10]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科尔伯格低估了年幼儿童的道德能力。科尔伯格认为幼儿的道德发展水平主要集中在前习俗水平上,而瓦克勒(Waxler, Z.)等人的研究发现,幼儿具有“解释他人生理和心理状

态的认知能力;在情感上体验他人状态的情绪能力;在行为上尽力缓减别人不舒适感的技能”。^[11]

二、科氏理论的三维修正与发展

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其从道德哲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创立了以两难道德判断为切入口的道德认知发展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思考道德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启发。科尔伯格的追随者们进一步拓展道德认知领域的理论研究,继续深入研究道德发展与社会习俗、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道德图式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对科尔伯格理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与发展。其中,主要扩展了习俗、情感与文化三个维度。

(一)道德与习俗交互:道德领域理论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纳希(Larry, P. N.)教授,作为科尔伯格理论的继承者之一,因提出“道德领域理论”(moral domain theory)而成为美国当代知名的教育与心理学家。纳希在其理论中细致探讨了道德、社会习俗和个人生活三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影响。他的“道德领域理论”将对教育的关注点投向道德和个人生活这两个重要领域。

纳希认为,习俗是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所以它对于个体社会化的教育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正如道德是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基本准则,习俗也是社会运转的基本准则。因此,形成儿童和青少年对社会习俗目的和功能理解能力,对于他们道德的健康成长具有教育价值。^[12]纳希还指出,多元文化和多样的社会习俗背景,使得人们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和习俗特性的道德观,从而表现为对同一行为或事件的道德意义的不同理解。因此,在确定的情境中,来自不同文化和习俗背景的人对同一事件的态度和行为表现是相对确定的。但当其面对的事件,在道德和习俗上存在冲突时,其行为的意义就变得较为复杂,或出于道德的考虑较多,或出于习俗的考虑较多,从而使得其道德判断和行为陷入矛盾中。因此,道德教育的价值就在随着儿童对社会习俗和文化知识水平的发展而培养其能够过完满生活的道德理解力。

纳希指出,个人领域是个体认为主要和自己有关,也因此处在可证明正确的社会规则领域之外的系列行为。这些行为不是正误的问题,而是个人偏爱或选择的问题。^[13]个人领域的内容也就是个人所认同的自由的内容。这种由个体自由选择的内容受到文化准则的影响并反映了个体的特性,反过来,这些内容通过不同形式的呈现也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因此,个人领域的功能就在于为个体要求自由提供源头和概念上的证明。个体形成对自由的要求,这点对其作为一个“单个人”参与交流(内部的和公开的)是有必要的,而这种交流就引起道德上的互惠、互尊和合作。道德交流把个体对自由的要求转化成相互的分享道德义务。在这个过程中,儿童在其个人领域的不断发展也同样影响着个体道德水平的发展。

总之,纳希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有力地推翻了皮亚杰和科尔伯格所坚持的道德与习俗的区分只发生在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进而提出儿童在年幼阶段就能区分道德和习俗领域。因此,纳希非常重视个体对道德和习俗的理解,他始终思考道德、社会习俗和个人自我观念的相互作用,这也是对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修正和完善。

(二)认知与情感交融:道德双面理论

在科尔伯格理论的众多追随者中,德国著名道德心理学家,康斯坦茨大学教授林德(Lind, G.)可谓其中较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他对科氏道德认知发展观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双面理论”,并创新性地设计和应用了著名的“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首先,林德强调道德认知的重要性,他认可科尔伯格对道德判断能力的界定,认为道德判断能力就是

“个体(基于内心的道德原则)对哪些是道德的进行决策和判断的能力,以及能够根据这些判断付诸行为的能力”。^[14]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林德提出的“道德双面理论”认为:道德必须包括情感和认知两个方面,即对道德行为的判断要从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两个方面统合起来加以考虑,这与科尔伯格所定义的道德判断几乎是如出一辙。其次,强调道德情感和认知这两个方面是可以被明显区分的,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分别描述和测量。然而,作为一个统一而又复杂的整体,道德的这两方面又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分离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使用同一种工具来测评道德情感和道德认知,但在促进儿童道德能力发展上,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改变和提高道德的这两方面。最后,道德情感和认知的发展在时间上是平行的,即某种道德观点的获得总是伴随着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儿童道德能力越高,就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道德观点,即发展到科尔伯格道德推理的更高阶段。^[15]

可以看出,林德的道德双面理论是基于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但又有显著的创新发展。首先,他认可个体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平行独立关系;其次,他又对道德认知和情感做了细致界定和区分,他是继皮亚杰之后敢于解释和分析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的复杂关系的人。另外,林德编制了“道德判断测验”,即第一个可同时评估道德判断和道德情感的工具,并以此验证了该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可以说,林德对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继承和修正,使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对于人们探讨道德认知、情感及其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三)图式与文化相嵌:新科尔伯格理论

科尔伯格理论新发展的集大成者当属他的学生莱斯特(Rest, J.)。莱斯特与其同事托马(Thoma, J. S.)、贝比尔(Bebeau, M.)和纳佛兹(Narvaez, D.)依据过去25年中持续对“确定问题测验”实证资料的收集和回顾,基于他们对科尔伯格理论所遭受批评的回应,并吸收认知心理学的新成果图式理论,于世纪之交提出了新科尔伯格理论(the Neo-Kohlbergian Theory)。新科尔伯格理论在吸收和保留科尔伯格理论的核心内容的同时,进行了变革与发展,可以用“坚持”、“保留”与“发展”三个关键词加以阐释。

一方面,新科尔伯格理论坚持了科尔伯格理论的核心观点。首先,新科尔伯格理论继承了科氏理论对个体道德认知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吸收新的认知科学思想,融入隐认知和缄默知识于道德判断中,拓展了道德认知研究的空间。其次,新科尔伯格理论像科尔伯格理论那样,关注个体对社会经验的自主意义建构。并更强调文化作为一种调节剂,可以加速或减缓个体道德认知的发展。再次,新科尔伯格理论也描述了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时间顺序。并认为,在个体道德发展中必然会经历由低阶段向高阶的发展成熟。最后,新科尔伯格理论继承了科氏理论对社会认知发展的观点,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是一个社会认知建构的过程,即从前习俗到后习俗思维的转变过程。^[16]

另一方面,新科尔伯格理论保留了科尔伯格理论的某些假设。比如,仍然使用基于“公正”的思维作为道德判断的基本原则和标准;坚持道德思维可以影响道德行为的设想;认为年龄和教育可促使道德思维逐渐复杂化;确定道德发展的后习俗水平,即坚信阶段5和阶段6是存在的,也是可以测量的。可以说,新科尔伯格理论继承和保留的这些观点和假设是科氏道德认知发展观的核心观点和假设,也是新科尔伯格理论不可抛弃的部分。

此外,“新科尔伯格理论”之所以“新”,在于它对科氏理论的创新发展。首先是方法上的发展。科尔伯格理论主要运用了道德判断访谈(Moral Judgement Interview),而新科尔伯格理论则开发与使用了确定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 Test)。确定问题测验与道德判断访谈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最明显的区别是,被试无需对问题做出完整的回答,而只需对问题称述的重要性进行评定和排序。这种方法考虑到了被试对道德两难问题的内隐理解,排除了言语表达的负担,同时,也避免了其他因素所引

发的变化,而只保存了被试对故事或陈述做出的反应。道德判断访谈必须由培训过的研究者在面对面的口头谈话中实施,所得数据难以整理,并且主观性较大,因而费时费力;而确定问题测验是团体的纸笔测验,操作简便、操作误差几乎为零,在计分和统计上有一定的标准,相对来说较为客观。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新科尔伯格理论对确定问题测验进行了创新性的诠释,莱斯特等人借鉴和吸收图式理论而创造性地建构了“道德图示”这一概念。正如托马所说:“确定问题测验故事和项目是激活道德图式的一种有效方法。当个体阅读道德两难故事(或确定问题测验的句子片段)时,道德图式就被激活了。当然,被激活的真实图式是受个体发展的程度所限定的。当评分者对某一项目的评定和排序都很高时,我们就假定,他理解了这个项目,而且表征的是一种所偏爱的图式。相反,当个体对某一项目评分很低,而且没有对它进行排序时,那么就可以假设,这个项目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太简单和没有说服力;就是说,它没有激活个体所偏爱的图式。”^[17]

其次是在理论上的创新。新科尔伯格理论紧紧追随认知科学的新发展,创新性地提出道德图式论,重新认识和界定道德发展的新旧思维转换的连续渐进替换性,而反对科氏理论中所谓特定阶段独断思维方式的论断。同时,新科尔伯格理论否定了科氏理论中强调道德判断的结构对个体道德认知发展的绝对作用,而提出能够将道德判断结构与社会、文化等具体内容有机整合的道德图示,因而要比科尔伯格的道德阶段更具体。在关于道德普遍性的问题上,科尔伯格是在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人类个体道德发展阶段的普适性,并进一步假设第六阶段即为普适性伦理阶段。然而,新科尔伯格主义却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思考而确证人类共同道德(common morality)的存在。

新科尔伯格理论提出之后,在道德心理学领域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道德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在确定问题测验实证资料的支持下,吸收认知心理学的新成果,针对科尔伯格理论遭受的批评和质疑,提出了新颖的理论构想。它是对科尔伯格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把科尔伯格创立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预示着向道德发展研究多样化路向发展的后科尔伯格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 [1] 郭本禹. 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科尔伯格的理论与实践[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9. 2.
- [2] 杨韶刚. 什么是有道德的人——当代心理学向科尔伯格提出的挑战[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 23(4): 48-51.
- [3] 赵雪霞. 西方道德教育模式的比较:正义与关怀[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08. 31.
- [4] Woods, C. J. P..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al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 A review of Kohlberg's and Gilligan's models of justice and care [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996, 24(4): 375-384.
- [5] [美]内尔·诺丁斯. 教育哲学[M]. 许立新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88-189.
- [6] Noddings, N.. Happiness and Educ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
- [7] [美]唐纳德·里德. 追随科尔伯格——自由和民主团体的实践[M]. 姚莉, 等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70-182.
- [8] [9] [10] [美]约翰·马丁·里奇, 约瑟佛·L·戴维提斯. 道德发展的理论[M]. 姜飞月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02-104, 102, 104.
- [11] Carolyn Z. Waxler, Marian R. Yarrow. 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maternal models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75, 11(4): 485-494.

[12][13] [美]拉瑞·P. 纳希. 道德领域中的教育[M]. 刘春琼, 解光夫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12, 69.

[14] Kohlberg L.. Development of moral character and moral ideology [M]. New York: Russel Sage Foundation, 1964. 381-431.

[15] Lind, G.. The moral judgment test: comments on villegas' critique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2006, 98(2): 580-584.

[16] Rest, J. R. & Narvaez, D. & Thoma, S. J. & Bebeau, M. J.. A Neo-Kohlbergian approach to morality research[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000, 29(4): 381-396.

[17] Rest, J. R. & Narvaez, D. & Thoma, S. J. & Bebeau, M. J.. A Neo-Kohlbergian approach: The DIT and Schema Theory[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999, 11(4): 291-324.

Beyond the Confines of Kohlberg's Male-centered Cognitive Logic—The Recent Improvements of Mor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PAN Leiqiong, HUANG Fuquan

(Center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ebates concerning the Kohlberg's mor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has never ended.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critically reveal such problems as male-centered subconsciousness, cognitive arbitrariness and linear logic in his theories. Male-centered subconsciousness neglects female and the "care" principle in moral development is excluded with the "justice" standard. Cognitive arbitrariness regards the essence of complex moral development as cognitive development, which inappropriately replaces the holistic process of moral development. Linear logic takes the moral development as the gradual "three levels in six stages", which overshadows its complexity and multicultural na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mentioned criticisms, new theories have developed to respond to those critical challenges. The care theory was created and the relationships were expanded between mo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ustoms, moral cognition and moral emotion as well as moral schema and social culture. The moral development theory was modified from customary, emotion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Key words: Kohlberg; mor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ory; moral development theory; Neo-Kohlberg theory

[责任编辑: 刘 怡]